

史苑传薪录

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

SHI YUAN
CHUAN
XIN LU

NAN KAI LI SHI
JIAO XUE
LUN WEN JI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著

史苑传薪录

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苑传薪录: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4

ISBN 978 - 7 - 80696 - 421 - 7

I . 史 . . . II . 南 . . . III . 历史—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 K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7559 号

史苑传薪录

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tjgj@tjabc.net

天津市宝坻区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2600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 - 7 - 80696 - 421 - 7

定 价:20.00 元

序

李治安

在《史苑传薪录·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付梓之际，我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情不自禁地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感言与看法，以共襄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举措。

近年，国内重点大学都在竞相建设研究型大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多数接近或超过了本科。多招收、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似乎成了提高大学的办学层次和向研究型大学迈进的标志。这实在是一种偏向和误导。殊不知国内外一流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都是永恒的基础。硕士生和博士生教育，高水准的科学研究，都依赖于本科教育的基础。没有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哪里谈得上优良的研究生教育，哪里谈得上高水准的科学研究。就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看，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源远比硕士生和博士生好，一味追求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育规模，势必造成资源上的浪费，既影响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质量，也影响本科教育的人力财力的投入，研究型大学的进展步伐反而会放慢。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缩小博士生的规模，各类硕士生的规模可维持或适当扩大，应花更大的力量抓好本科教学。这样，才能形成人才培养的“金字塔”科学体系，形成一层比一层优秀的良性培养机制。在培养层次良性化的过程中，本科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编辑这部教学论文集的宗旨和出发点。

南开历史学科向来有重视本科教育的优良传统。80多年来，郑天挺、雷海宗等名家名师常年给本科生授课，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授课精彩的老师往往能给学生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印

象,往往能使学生终身受益。这就是良师的魅力所在。即使在网络多媒体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良师的魅力也是无法替代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郑天挺在主楼 327 教室为 77 级、78 级本科生授课时的情景。类似的美好记忆,每一届学生都会有的。认真授课,认真抓好本科生教育,对培养学生实在太重要了。前几年,曾经发生优秀教师脱离本科教学而专门从事科研的偏向。对此,我们已经坚决予以纠正,目前本科生的两门通史教学已经被确定为教授岗位,若干名资深教授重新出现在通史讲坛上。

深入开展本科教学的研究与探讨,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和优化教学效果的必要手段。20 世纪 90 年代,南开历史系曾经专门编过一本《浇灌集》,汇聚了十几篇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探讨的文章,在教师中发挥了很好的交流示范作用。这次我们编辑的教学论文集,就是要在《浇灌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真研讨本科教学的相关问题,以取得交流经验,促进教学的积极成效。共收入文章 40 篇,分列在“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教材与教法”、“大众历史教育调查研究”四个栏目下。既有魏宏运教授、王连生教授、傅政教授等老教授的经验之谈,也有刚走上讲坛的青年教师的心得体会。课程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博物馆等专业,又有基础课和选修课教学、课堂作业、论文写作、文献功底、教材编纂、多媒体运用等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学生课题组有关“社会大众历史知识调查研究”的七篇报告。30 名左右教师参与了这项工作,主管院长王利华教授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准备工作。我相信这部教学论文集的面世,一定会有力推动我们的本科教学工作,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增添新鲜活力和驱动力。培养国内外一流的历史学本科生,是我们宏伟而艰巨的目标,我相信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2006 年 11 月于天津南开园

目 录

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

我的教学实践与经验	魏宏运(3)
多维创新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王利华(9)
突出综合素质教育 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孙立群(16)
历史教学与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哈全安(22)
关于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几点想法	张分田(25)
浅谈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生的研究型教学	王利华(31)
关于大学文科本科生基础教育改革的一点想法	张分田(34)
漫谈大学本科教学中的“教”与“学”的问题	孙卫国(37)
世界近现代史本科教学工作的思考	李 凡(41)
南开大学历史学人才基地建设的若干经验和特色	王利华(46)

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

两种世界史课程体系之比较	陈志强(61)
中国社会史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冯尔康 常建华 孙立群 阎爱民(66)
引导学生打好文献功底	赵伯雄(70)
增加教学内容信息量问题浅议	陈志强(74)
改进世界现代史教学的几点认识	肖玉秋(78)
浅谈世界当代史课程教学改革	李 凡(81)
关于中国古代后期史教学及创新的几点体会	王晓欣(85)
新形势下如何搞好“中国古代史”的教学	孙立群(95)

趣味、理性与创新——讲授本科生主干课程“20世纪

中国史”的若干心得	江 沛(101)
让学生有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底蕴	
——谈“文哲名著导读”课程的教学与改进	乔治忠(108)
谈谈拉丁美洲史教学和科研的几点体会	王 萍(112)
从学生与学科特点出发讲授“敦煌学”	王力平(117)
“中国古代陶瓷器”授课的几点体会	刘 毅(122)
中国考古学通论及文博应用技术的教学实践和改进 …	程平山(128)

教材与教法

论历史文选课的教材编纂形式	阎爱民(133)
精选教学素材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李永胜(139)
历史教学中的多媒体手段运用	肖玉秋(145)
世界近代史立体教学法概述	张伟伟(149)
实践第一 授人以渔	
——“专业英语”实践教学法点滴	张伟伟(155)
“请同学上讲台”	
——着眼于提高本科生研究技能的一种尝试	王利华(164)
多与学生交流是讲好课的重要环节	王连升(172)
我是怎样安排学生随堂作业的	傅 玮(175)
学生论文写作指导二题	张荣明(178)
谈谈自己培养硕士生的一点体会	陈德弟(181)

大众历史教育调查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社会大众历史知识调查研究”课题组

社会大众历史知识现状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187)
社会大众历史知识调查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	(214)

史学成果的社会化：问题与对策	
——基于问卷调查的几点看法 (223)
当前中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缺陷和我们的几点建议	
——基于问卷调查所得出的几点看法 (229)
初中学生历史教学状况探析	
——对安徽省郎溪县幸福乡幸福中学学生问卷调查 结果的解读 (235)
热播历史剧与历史教学的社会化 (246)



◀ 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



南开历史教学论文集

我的教学实践与经验

魏 宏 运

1951 年我从南开历史系毕业，任助教。当年系主任是吴廷璆，第二年改为郑天挺，吴先生到学校任总务长。在吴、郑两位师长的栽培下，我开始执教鞭。我很喜爱这一职业，中学时读韩愈的《师说》，其中讲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就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教书育人。

头两三年，我先给中文系、外文系新生，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随后给历史系本科生讲“中国现代史”，一直讲到“文革”开始。“文革”后期给几届工农兵学员讲过“中国现代史专题”。1978 年以后，我继续主讲“中国现代史”和一些专题课程。

1979 年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中国现代史讲习班，由我负责。我主讲了“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和实践”部分。1983—1984 年受美国 Fulbright 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蒙他拿大学讲课三个学期，讲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文明史”、“武汉革命政府”、“今日中国”等课程。

回想起来，我几十年中讲授的课程计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五四运动史、土地革命史、南昌起义史、武汉革命政府史。专题课程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毛泽东思想、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法论、中国考古新发现、丝绸之路等。

我上课的地点先后在胜利楼一楼阶梯教室、思源堂二楼、主楼二楼，听课的同学以 1958 年毕业的人数最多，约一百二十人。有好几个

年级约八九十人。给研究生上课先在主楼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后在文科楼中国现代史教研室。

二

讲课是一门艺术，教师讲课各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讲得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有的讲得较平淡，但内容丰富；有的口若悬河，内容比较空泛；有的条理清楚，很注意板书等等。五十年来，在南开园这样一个知名学府中，我耳闻目睹过教学中的各种现象，尽量吸收前辈和同仁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从中受益极多。

回想起来，早年就读大学和初期任教时所接触的资深老师的教学形象、技巧和方式，依然历历在目。辅仁大学的余逊先生，在讲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课程时，对史料背景滚瓜烂熟，把要讲的一段史料写在黑板上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在南开，郑天挺和雷海宗两位先生的课程倍受欢迎，他们上课时不用讲稿，只拿几张卡片，就旁征博引、驾轻就熟地讲起来，效果极好。几十年来，我一直把他们视为榜样进行着教学实践。

在辅仁大学上学时，我曾在青年会办的夜校讲过课。1949年暑假，我也在天津第一中学讲过“社会发展史”。这些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锻炼，然而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大学授课。1951年留校任教后，开始讲课时，我的心情总是有些紧张，怕讲不明白。因为面向大学生要系统地讲授一门课程，要求是很高的。要想讲明白，自己先得明白，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昭昭？这就得改正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我尽力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冥思苦想诸种历史现象间的关联性。记得讲“中国通史”时，曾参考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教程》、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司马迁的《史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书。讲“中国现代史”时，经常翻阅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上海三民公司印的《孙中山全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毛泽东选集》、斯诺夫妇《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以及《新青年》、《向导》（周刊）、《大公报》等报刊。一个人即使精力超人，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资料，只能有选择地重

点阅读一些基本史料及论著,建立起一个对所研究的时代及领域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及认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可以不被称为门外汉了。

我的知识来源是多方面的,大学时代学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及有关课程;任教后,我经常向冯文潜、郑天挺先生请教,傍晚时,我们经常围绕新开湖散步,边走边谈,获得了许多的教诲;从1951年起,吴廷璆先生主编《历史教学》杂志,约我参加编委会。我们经常一起审稿,他让我为读者解答一些问题;时任图书馆正副馆长的冯文潜、张镜潭先生对我倍加关照,假日和星期天给我一“特权”,允许我在书库中学习。那时我也是一个“购书狂”,经常到天祥商场和劝业场楼上的旧书摊“淘金”,有时把工资的三分之二都用于买书,曾横下心来花30多元买过上海复社版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还买过蒋介石和冯玉祥来往书信集。可惜,这些书在“文革”时都被人抄走了。有时,我也做一些社会调查等。就这样,脑子里装的东西逐渐多了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系里担任行政职务,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集中精力备课、研究。为节省抄写讲课资料的时间,一些主要参考书我都买三套,两套用于剪贴、分类,留一套备用。对同一问题的资料阅读两三遍,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譬如《毛泽东选集》、《“二七”回忆录》、《中国红区印象记》、《中国的暴风雨》、《土改整党文献》等书,我都买了三套来剪贴。对《毛泽东选集》,我能熟稔到能记得什么问题是在什么文章中讲的,可以在哪一章哪一页找到。但没有料到的是,剪贴《毛泽东选集》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做法,竟成为“文革”中斗争我的一大“罪状”——“销毁毛选”。

讲课时,我总是提醒同学不要埋头记笔记,做笔记的奴隶,要注意听讲,要根据教师所讲线索找书自学。当时的条件较差,有好几年,我总是从图书馆借出相关的书籍刊物,放在一起展览,使学生对史料文献有一个直接的观感,那时学生们没有时间去翻阅一些珍贵资料的原版,通过看展览,见识见识,印象就深刻得多了。

我常带研究生到校图书馆去翻阅稀有的《海关册》、《北洋政府公报》、《盛京时报》等资料,到市图书馆去看《益世报》、《Peking&TienTsin Times》等

报刊,以扩大学生的视野。现代传媒的出现,使得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都可以从报刊上找到相关记载,因此养成翻阅报刊的习惯,对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我还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思维,在讲课时,我经常介绍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并讲授我对这些争论的评价,使学生们熟悉学术动态并激发他们的思考。如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住了一宿,当时的《大公报》和黄昌谷日记均有记载,而天津学者为住了几天争论起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好多篇文章。这种争论可以说意义不大。教师的职责是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教给年轻的朋友,使其在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即使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及了解。出于让青年学生打好古汉语和阅读古籍基础的初衷,我常常选择《史记》和《明史》的部分篇章,印发给他们阅读和领悟。我劝他们有空时读读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活页文选》,从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可以改进自己的文风。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过去不大注重对外文的学习,缺乏一种将中国现代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思考的视野。为提高研究生们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我开设了专业英语课,从《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The Venetian],《The Stilwell Papers》和《毛泽东选集》英文本选出片断,共同朗读和讲解,不仅借此纠正他们的发音,也使得他们从中体会到外文史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和郑天挺先生就号召历史系同仁攻读外文和古汉语,比喻为“两座大山”。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在图书馆阅览室问历史系同学是否读过《饮冰室文集》的文章,让外文系同学读一段外文。这使我更坚定了历史研究必须打好语言基础的认识。恰在这时,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提出了历史系培养的方针是“一论二史三工具”,我深表赞同,认为具有指导意义。1958年学校开展“拔白旗”运动,一些老教师受到批判,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大跃进”运动过后,总结经验教训,使教学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是极为重要的。

上级组织也提出要精雕细刻，切勿大轰大嗡。身为系总支书记的我，积极贯彻这一方针，逐渐使历史系的教学回归常态。

应该说，教师是课堂上的主角之一，教学态度和学术风格对同学影响极大。我首先要求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史观，对待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在研究中上也力主创新、深入，对学生们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三

教学是相长的，是一种互动关系。我在研究生课上，多次讲到韩愈《师说》中的名言：“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和青年学人接触中，始终平等相待。在和他们的接触和交谈中，颇多收益。中国现代史的领域非常广阔，书籍刊物最多，难以尽览，他们阅读过的一些书籍，我没有读过，他们说出来，我就获得了一份知识。他们有时提出一些问题，也常常能促使我去思考。在学问上相互切磋，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也是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研究中国现代史，一定要进行社会调查，把书本知识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田野调查，既可以补充课堂上知识的不足，又可以实际锻炼研究历史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创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中国经济的许多学者都是身体力行的。他们的知识与研究，建立在一种集体形成的、不容辩驳的真实性基础之上，对我启发很大。1958年，我和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柳心商议，共同调查天津义和团的历史，由博物馆出经费，南开历史系同学参加，调查了天津周围各个村庄，征集了大量文物，访问了123位尚健在的义和团民，记录了他们的谈话，成为极为珍贵的史料，所收集的文物还在北京展览过。1964年，我请同事杨圣清到河北省丰润县参加县志的编写，到霸县东台村参加调查韩复榘的家史。“文革”后期，我和汪茂和同学到大沽和天津间的村落，调查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中的罪行。改革开放后，我和研究生们一起，到冀东和太行山区进行调查，记得当时条件是艰苦的。在冀东，朱德新、付建成、温锐三人到迁安调查时，各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跑一整天，晚上回到住处，也

没有地方洗澡，身上都生了虱子，两个星期回来洗个澡，烫了衣服，然后再回到原地调查，这一经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是铭诸肺腑的。他们的成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之研究》，都为学界所称赞。其他像李正华的《乡村集市和近代社会》，乔培华的《天门会研究》，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借贷之研究》，都是在农村中寻找文化的资源，写出了自己独特的论文。

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我经常告诉同学要不懈地努力，继承中国优秀的历史研究传统，也要吸取当今海内外的历史研究法，切不可自满，“满招损，谦受益”，这是真理。有的青年朋友在自我评介的论文中，喜欢说一句自己的论文填补了某一学术领域空白的话，我对此总是持否定态度。我多次引用歌德讲过的一句名言：“一本学术著作的真正价值，一百年之后才能看出。”自我“包装”无助于学术发展。

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良师为教育的基础。作为教师，肩负着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教师职业的价值及作用，不是其他行业所能代替的。回想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我想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给人以启示的吧。

多维创新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王利华

一 研究性教学重在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

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自主创新能力,是实施 21 世纪强国战略的关键。在这方面,大学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大批富于创新精神、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专门人才。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大力推行教学改革。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五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接受性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在基础知识的学习方面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但却存在着重知识轻思维、重结果轻过程、重课堂轻课外、重记忆轻运用、重教材轻阅读、重教师轻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等多方面的严重缺陷。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依靠机械练习和记忆来掌握知识,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则受到严重抑制,其结果是,培养的人才缺乏个性,创造力不足,只会亦步亦趋的“高分低能”学生被大批量复制出来,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这一严重弊病,必须通过大力推进研究性教学予以革除。

我们认为,研究性教学不同于以往的接受性教学,而是一种培养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新型教学方式。它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培育创新精神,二是培养创新能力。所谓“创新精神”,就是不唯书、不唯师和不唯